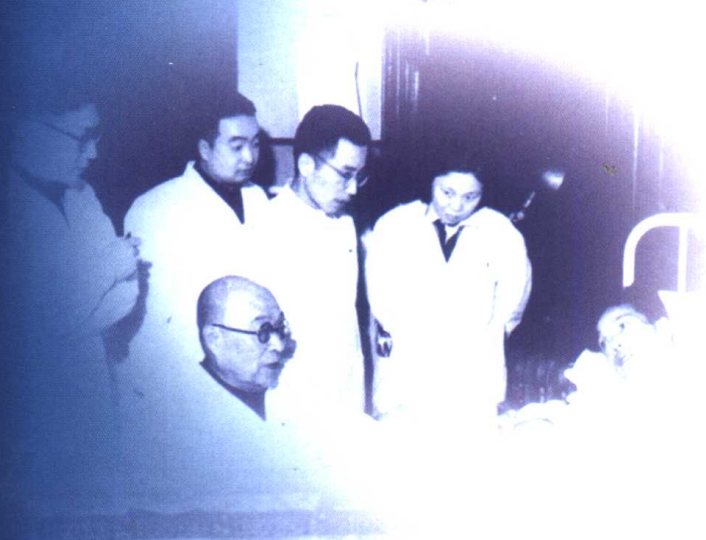


百年 北京中医

○ 谢阳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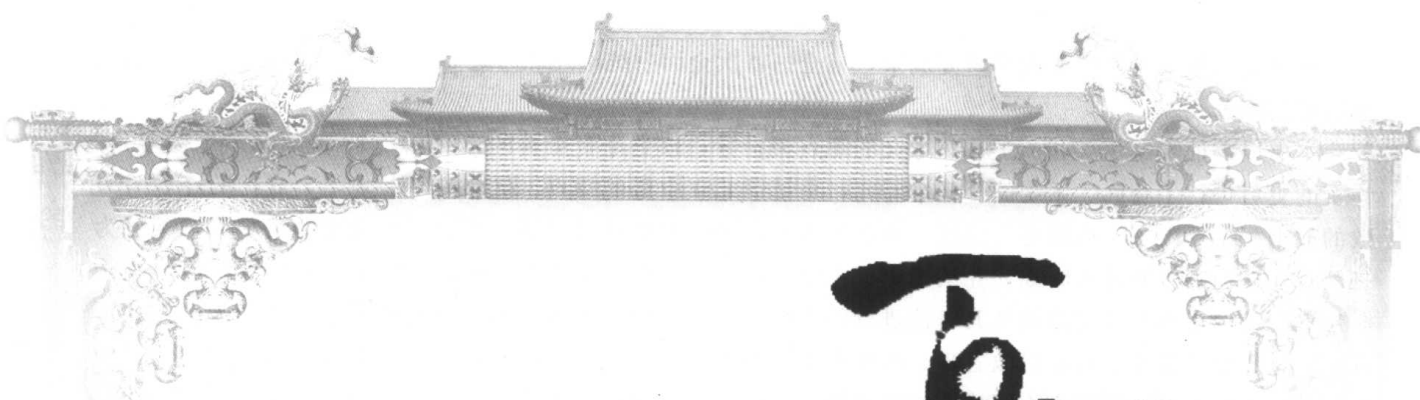
同仁堂藥目
本堂藏版



堂年寓



化学工业出版社



百年 北京中医

○ 谢阳谷 主编

余靖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是部级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是全国首次全面系统论述北京近百年（1900～2000 年）中医发展历史的专著。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以史论带史料的方式，对 20 世纪北京中医丰富、详实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总结了北京中医的特点、优势与发展规律，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并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本书按清末时期、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分为三篇。在日趋衰败的清末时期，介绍了中医中独具特色的宫廷医学；在中华民国时期，介绍了中医界人士与疾病、与废止中医药的政策及其言论进行的不懈斗争，中医历经坎坷而得以缓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介绍了北京中医在医政管理、医疗事业、中医教育、科研、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学术团体、出版事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形成独立完整的中医体系，并取得巨大的成就，突出了北京中医历史文化与科技完美结合的特点。

本书客观上也反映了数千年来我国中医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史为鉴，相信本书对今后我国的中医事业及我国中医现代化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北京中医/谢阳谷主编.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122-01106-0

I. 百… II. 谢… III. 中医学-医学史-史料-北京市
IV.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7380 号

责任编辑: 叶 露
责任校对: 李 林

装帧设计: 韩 飞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1 字数 1946 千字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9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百年北京中医》编委会

顾问 余 靖 李经纬

主 编 谢阳谷

副主编 高益民 张志斌 马 静

专家指导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生龙 马继兴 王为兰 王雪苔 方和谦 关幼波

危北海 李广钧 李经纬 陈可冀 陈彤云 金世元

郑金生 贺普仁 柴嵩岩 翁维良 路志正

常务编委 马 静 袁 越 郭天玲 王冠雪 刘殿勇 高丹枫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凤兰 王文娟 危北海 张志斌 张瑞贤 郑 蓉

徐江雁 郭天玲 梁 峻 董泽宏

序 一

中医学是具有原创思维、原创成就、原创优势，至今仍为最广大群众冀重欢迎的医学科学，是中华民族独有特色、最为宝贵的文明财富。综观全球，晚近医学科学已由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新世纪更加凸显出对亚健康的干预与现代难治病的防治两大关键问题。健康理念不仅要求身体无病痛，心理调适能力强，而且要求在社会活动中最有活力。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中医学有着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学科。所以，当迈进后科学时代的时候，人们对传统医学，尤其是对中医学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更大的包容与兴趣。在华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学者居于前列。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医学者来说，如何谋求自身更为健康、更为科学、更为快速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选择“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作为课题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首先，20 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相比，100 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在这短暂的 100 年中，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却是以往数千年中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在这百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三种社会制度的变革。曾经数千年，似乎亘古不变的封建王朝统治被推翻，接着在不到 40 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变、世界大战的硝烟、内忧外患的困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一系列变革。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一切变革中首当其冲，更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第二，北京是我国的三朝古都，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辉煌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也是北京深厚文化积淀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南北医家多汇集于此，形成了中医学术百花争艳的繁茂园地，应该是全国中医学发展的颇具典范意义的模型。北京虽然历经锤炼，但仍以崭新的面貌岿然屹立，显示出祖先创造的文化之博大精深。第三，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医学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引导我们决策学科建设目标与研究方向，预测学科发展的趋势。中医学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从自身的历程中寻找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总结北京近百年来走过的中医学发展历程，如实地寻找并勾画出我们先驱留下的足迹，去发现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弯路，哪些是可以仿效的捷径，这是一项十分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虽然，作为近现代史的“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面临着经验欠缺与资料零散的困难，但是课题组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不仅整理了百年来北京中医事业发展的轨迹，而且总结了发展的成就、优势、特点与规律，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诸如北京具有历史文化与地理区位的特殊优势，表现在北京具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具有高素质、高层次、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北京是中医政策落实、贯彻、执行的示范区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事业发展的核心地带，是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交流整合的前沿，是中医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开放门窗等方面。并根据北京中医学所具有的宫廷医学特色、学院派医学特

色、师承家传的医家独特理论与技术特色，以及全国各地来京的中医专家带来的多彩风姿等北京的特殊优势特色，提出燕京医学学派的形成这样一个新概念。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通过课题研究之后，对北京中医事业继续发展提出的意见。如课题研究中发现区县中医医院的建立中存在无论条件是否成熟，急于把中医院牌子挂出来的做法。如此则难以保证中医院的内涵建设质量，尤其是在办院方针、人才配备方面会带来困难，中医医疗事业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因而提出了“谋求高速发展的同时尚须克服浮躁情绪”的建议。这样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能够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20 世纪中叶，我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疗专业，曾在北京市中医医院临床实习，受益于多位高师的教诲。1976 年以后，我又曾为北京市中医本科人才培养执教。可以自豪地说：北京中医前辈造就了我，我为北京中医教育尽自己绵薄之力。本书脱稿，课题组邀我写序，实则对我鼓励。敬阅著作文稿，深受教育，乐观厥成，爰为之序。

王永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乙酉年望月初八于北京

序 二

《百年北京中医》是一部以世纪为史述单元、以中医为史述本体、以地方为史述范围的中医事业发展史。经过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组织实施和“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课题组的艰辛努力，终于在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完成并付梓，值得祝贺。

《百年北京中医》是 20 世纪的断代史。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百年，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科技迅猛发展的百年，又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之路的百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医走过了在旧中国艰难延续、濒临消亡而在新中国逐步修复、重新崛起的道路。《百年北京中医》可以说是中医百年沧桑的缩影。

《百年北京中医》是中医的行业史。任何行业 and 任何事物要有特色才能生存，要有优势才能发展。数千年来，经过历代中医药学家的不断继承和创新，中医形成了独特生理观、病理观和疾病防治观，善于从整体、功能和动态的角度把握生命和疾病演变的规律，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鲜明特色，具有临床疗效确切、用药相对安全、服务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等主要优势。《百年北京中医》以翔实的史料，从临床、教育、科研、管理等方面全面地展示了 20 世纪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是北京中医事业发展的一轴历史画卷。

《百年北京中医》是地方史。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也曾经是历史上多个朝代的帝都，在中医药文化的孕育与弘扬、中医药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中医药机构的设定与演变、中医药名家学术经验的继承与创新、中医药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京都地区特色，《百年北京中医》以大量的数据和事例真实记述了中医的京都特点，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

《百年北京中医》是“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科研的灵魂是创新，这个课题将断代史研究、行业史研究、地方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以中医为史述本体的综合研究，这是中医史学研究领域的创新，这种科研思路和科研方法的探索、创新为取得课题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北京中医》3 篇 18 章总结的历史记录、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为北京和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借鉴，可以作为中医药事业管理者 and 中医药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史述万代事，鉴古以观今。从北京中医近百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曾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不朽贡献的中医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也一定能为保障人民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医药需要社会支持，社会需要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将在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实践中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



2006 年 3 月 6 日

序 三

北京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居民是“北京人”，距今已有 70 万年的历史。最早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是蓟和燕国，最早的都城是蓟城和琉璃河古城，距今已逾 3000 年。秦统一中国后 1100 年间，蓟城——北京，是县、郡、州的治所。其间，公元 911~913 年为五代燕的都城；公元 938~1122 年为辽代陪都；公元 1125~1251 年为金代首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1912~1949）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一直是我国的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的近两千年间，第一个一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西安；第二个一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北京。北京作为千年五代帝都，其中四代（即辽、金、元、清）分别是以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为主体建立的，说明北京集中表现了中华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特点。800 年来，北京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现代北京更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学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在亚洲、在世界都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北京中医有着许多特色与优势，是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作为 800 年之首都，北京一是有全国无数著名中医，为开阔眼界、提高学术，前往京师行医，交友切磋学术；二是有历代太医院高手御医亲自培训的众多医家；三是为满足皇室医疗需要，多年来从全国招揽推荐名医、高手，构成北京御医群体，略计之约 600 名，他们及其子孙多在京开设诊室，从事疾病防治与学术研究。同时，数百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内国外交流，中外学者共同讨论中医学术，知识体系续有更新。北京土生土长的中医，或来自全国各地名医，以及御医群的中医学专家，在历代的医疗、疫病防治、科研工作中，自然形成了北京中医的优势与学术特色。这些学术上的特色在相互的交流、交融和促进中，不断得到提升，与其他地区相比，北京中医药可以说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历史是一面镜子，认真总结研究历史更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学术价值。2001 年，我有幸应邀参加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关于“北京中医发展史略研究”课题专家论证会。会上，许多知名专家对此课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一致赞赏此项研究是北京中医发展的一项意义深远的科研工作，期待能做出有价值的成果，以为北京中医继续发展的历史借鉴。在这次论证会上，作为一位中国医史学研究者，我除十分赞成诸位专家的意见外，对北京中医 3000 年发展史，从实际出发，建议首先从 20 世纪的 100 年着手，取得成功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然后可分段进行调查研究，乃至最终完成整个课题研究任务。不久后，我荣幸的应邀担任该课题顾问。对此，我很高兴能在年逾古稀之时，参与这一很有意义的医史学研究工作。

“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课题的启动，从研究计划制定、科研方法到子课题确定分工落实等，我都参与了讨论，令我高兴的是与数十位研究者的合作十分愉快。3 年多以来，11 个子课题组长与参与调研者，埋头工作，他们深入各有关档案馆、图书资料馆、博物馆等，并对健在的中医药老专家及其子女等进行了口述史调研与收藏文物资料整理，获得了大量的史料（文字资料与文物图片资料）。在这些良好基础上，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所得资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研究，描绘出 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极为丰富的内容。初稿完成后，经过多次子课题间的互审、多次相关专家的评审、多次会议的总体共审以及邀

请专家进行统稿等，不断加强各子课题间的协调，删除了重复，逐步缩小了认知上的差异，使 20 世纪北京中医发展的内容更加丰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百年北京中医》是一部创作，是一本填补空白之巨著，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论述之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对 20 世纪北京中医方方面面发展的历史，不单总结了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更为今后北京中医发展提供了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我深信该书的出版，将为各级医疗部门卫生领导与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佳作。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为之撰序，抒发 3 年多来围绕此项科研工作的感受。特别是各位研究者辛勤努力，孜孜不倦，日夜求索，反反复复修改以求完美的精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在此，特别对该课题的组织者、主编者以及各子课题的全体工作者，特别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深切敬意与感谢。我不止一次地通读全文，使我对北京中医在 20 世纪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是我难忘的一次经历，特述以为志。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李静' (Li Jing),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2006. 3. 20

前言

本书是根据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部级科研课题——“20世纪北京中医发展史研究”成果编撰的。本书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思想，经过3年多的努力，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文献检索、个人采访等多种形式，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并经过多位中医史学专家参与和认真的筛选、核查、研讨、论证而取得大量的科研成果。本书以史论带史料的方式进行表述，以“北京中医发展史略研究”总课题作为切入点，是全国第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北京中医发展史的大型专著。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周口店“北京人”及其遗址的发现，足以说明北京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西周初年，燕国建都蓟城于此，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后来又有燕京之称。历经金、元、明、清等朝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共和国）成立，并定都于此，誉称为五朝故都，是中华民族政治、历史、文化的中心和首善之区。

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医疗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独具特色与优势的医学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翻开医药卫生史的画卷，中医药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据上古传说，中国古代医学的创始人是黄帝、岐伯，因此医学在中国又被称作“岐黄之术”。早在公元前5世纪，我国史书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名医秦越人（扁鹊）就掌握了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多种疾病的诊疗技术，擅长望、闻、问、切，达到了当时的医学巅峰。公元2世纪，华佗发明了中药麻醉剂——“麻沸散”，在外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公元4世纪，葛洪在炼丹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化学试验，被称为制药化学的先驱。公元6世纪，隋朝太医博士巢元方总结编著了《诸病源候论》50卷，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部探讨病因病理的专著。公元7世纪，唐王朝颁发流通全国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11世纪，宋代针灸专家王惟一与能工巧匠一起设计制造的针灸铜人，是当时最先进的教学模型，现仍堪称世界一绝。12世纪，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14世纪，骨伤科专家危亦林发明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成为骨科史上的创举。16世纪，我国已经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被称为免疫学的先声。这些史实无一不说明中国医学的显赫成就和在世界医学上的重要地位。

我国现存的中医药典籍有8000余种，记载的处方有60000余首。这些医籍是历代著名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炼精华，呕心沥血编著而成的。

中医的奠基之作首推《黄帝内经》，它集古代东方文化中优秀的哲学、天文、地理、气象、伦理、文学、医学等各种相关知识于一体，不仅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影响长达两千多年，至今仍被奉为中医学之圭臬，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医学巨作，也是习医业医者必读必通之经典。

中医史上又一力作是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如果说《黄帝内经》从理论上为中医奠定了基础，张仲景则以“辨证论治”为中医临床诊治确立了原则和体系，是中医临床诊治学的核心和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彪炳于医学史册，而且至今仍指点着医界，后

世尊称张仲景为医圣。秦汉出现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另外两部著作《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均指引中医思辨、临证，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均为中医药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宋朝《太平圣惠方》是官方组织医家花 10 年功夫编撰而成的综合性医著，是总结 10 世纪以前医学进展的大型临床实用方书。全书共分 1670 门，录方 16 834 首。它开辟了官方编撰医学著作的先河。

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更是我国古代科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本草纲目》共 16 部，52 卷，约 190 万字。全书诸家本草所收药物 1518 种，增收药物 374 种，合 1892 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 11 096 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 1100 幅；系统地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我国医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并旁涉了众多相关学科的知识。这一巨著被其后的中外学者称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备受重视，影响遍及整个世界，已成为耸立于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里程碑式的著作还有：明代的《景岳全书》、《类经》，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明末《温疫论》一书，揭开了中医认识传染病的新一页；清朝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不胜枚举。这些弥足珍贵的医学遗产堪称伟大的医学宝库。

在五千年发展的历程中，以生命科学熔铸，以人文哲学渗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也是东方人文与科技相融汇的杰作。中国医药学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人类健康事业和世界文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百年的 20 世纪风云中，北京的中医事业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透过历史的烟云，可以清晰地看到先贤们不屈不挠、奋勇开拓的精神，燕京医学学派即在这块古老而又积淀着深厚文化的沃土上逐渐形成、延续和发展。北京中医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全国中医学的缩影。因此，揭示北京中医发展的规律，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对今后全国中医学的发展也会有所借鉴。

本书的内容是对 1900~2000 年北京中医百年发展的史实论述，全书共计 3 篇 18 章。

第一篇（第一章至第三章），清末时期（1900~1911 年）：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短暂过渡时期。作为清王朝的京都，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医学面临着西学东渐、中西医交汇、竞争图存的局面。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医学界最有影响的大事是光绪新政的医学机构改革。但主体上仍然是沿袭元、明、清太医院，御药房掌管全国医药行政、医学教育及为皇室贵族医疗服务，是北京独有的宫廷医学学派的传承。由于清朝政事衰败、财政不敷，虽几经酝酿整顿和改良，但终究未果。另外，建立官医院也是新政改革的措施之一，1910 年官医院划归为民政管理，均为免费诊察投药，虽有一定慈善机构的性质，但仍具有公立常设医疗机构的特质，成为历史上开建公立医院之先河。总之，清末进入 20 世纪，从社会体制而言，这一时期是个过渡时期，在这风雨飘摇的 10 年里已趋衰败，无论是新政改革，还是中医学术均无太大的建树，但却预示着封建社会的末日即将来临，卫生保健事业也将面临新的选择和发展机遇。

第二篇（第四章至第十章），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 年）：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方文化猛烈冲击本土文化，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态势。中医学的发展除延续清末时的传承之外，即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激烈地展开。在此期间，有关中医命运的重要大事是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斗争。从北洋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应当取缔”到1929年南京政府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都激发了全国广大中医药界的抗争。北京中医药界更是空前团结、积极行动，并派代表参加抗议北洋政府的“医药救亡请愿团”，经过抗议活动的洗礼，建立了北平中医公会，组织以孔伯华、施今墨为首的“华北请愿团”汇同全国的同道南下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相继中医考试制度也逐渐地得到恢复。1929年10月29日政府下令核准《北平市卫生局中医士考试委员会简章》，其他相关的营业章程、暂行规则等均不得不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时期，北京中医学发展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医疗方面，虽然西医医院远多于中医医院，但中医的从业人员明显多于西医的从业人员（约计8：1），担负着北平地区80%以上的医疗任务。在传染病的防治中中医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杨浩如、张菊人等1911年在晋绥地区及廊坊一带组成防疫医疗队，遏制了当地的瘟疫流行，因此，在临床医学方面发展得比较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正骨各科也都有杰出的临床学家出现。如温病方面有袁鹤侪、汪逢春；疑难杂症方面，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等四大名医享誉全国；外科方面，丁庆三、段馥亭、房兴桥等名家各有擅长。此外，上驷院绰班处、少林派的正骨、推拿、按摩均独具风格。

在中医药科学研究方面，也开始了新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做出显著贡献的科学家有陈克恢、赵燏黄等教授。麻黄素的研制成功就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在中医教育方面，从师承家传、自学成才等传统模式向正规化的学历教育转化。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当时名医耆宿兴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都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和教学模式。1939年汪逢春还开办了具有继续教育性质的业余夜校“北平国医讲习所”。

中医药学术团体是中医药界自发成立的组织，如1923年的“北平中医学社”等，学社还创办了《中国医药月刊》杂志，编著中医药文献，成立“中国医药研究会”以及后来的“北平国医职业分会”等，也曾创办过《北平医药月刊》、《国医砥柱》杂志，开办了中医讲习所、研究班、中医诊所。在发展中医学术和团结中医争取合法权益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中华民国时期北平中医的发展史，是北平中医界人士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也是与废止中医药政策及其言论作斗争的历史。在这段时间内，北京中医学在极其复杂与坎坷的道路上，仍然缓慢地向前发展，取得的成就仍然是较大的。在艰难之中蕴涵着新的生机，并在北京以及全国中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三篇（第十一章至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40年代末，在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北京的中医学和全国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千年而不衰，几经摧残而不折，显示了灿烂的无限生机。20世纪下半叶，虽然西医学已经广泛地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但中医仍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并不遗余力地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一切依靠的是党的中医政策的正确引导，依据的是中医科学性的内核与良好的临床疗效，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实际需

要。为了便于完整而又系统地研究近半个世纪北京中医发展的历史，第三篇从中医医政、医疗、教育、科研、中西医结合、学术团体、出版事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八个方面横向展开，进行研究与论述。

医政管理（第十一章）：党的中医政策与北京作为首都这两个基本条件相结合，为北京中医事业的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建国初期，重点是中西医团结合作，目标是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继承并发扬祖国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为农村开展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指明了方向，反映了国情民意，并且很有成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北京中医发展又获得新的机遇。1978年，邓小平指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明确要“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北京也于1988年成立了中医管理局。继承老中医经验和名医带徒工作，北京也走在全国的前列，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199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实现中医药现代化”。2001年3月4日，江泽民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教育医药卫生联组会上讲话时，再次强调中西医并重、继承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等问题。在三代中央领导人的正确指示下，特别是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北京中医的责任是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的作用，为北京居民造福，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领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北京中医得到大力扶持、发展和振兴，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导下，各项管理工作以继承、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为宗旨，按照中医学学科自身的特殊规律发展中医事业。北京在中医机构与医政上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管理体系。

医疗事业（第十二章）：中医医疗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医疗机构的发展和临床业务水平的提高。1949~1955年，是个体开业、联合诊所及门诊部发展阶段；1956~1967年，是中医医院组建的奠基阶段，北京开始建立国家所有制的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和广安门医院、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门头沟中医院等；1966~1978年，是中医机构的缓慢发展阶段；1978~1989年，是全面发展阶段，在此期间新建了6所区县级中医院，许多综合医院建立了中医科，中医个体开业也进入了较为规范化的轨道；1990~2000年，是持续发展与专科医院建设的新阶段，在医院管理上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开展了医院等级的确定与示范中医院、示范中医科的建设，并加强了各级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中医医疗机构体系与网络已初具规模。

北京的中医临床业务在学术上具有鲜明的特点，既有宫廷医学学派的传承，又有学院派、师承家传的独特技艺，南北医家经方派、时方派也汇集于此，形成了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中西医相互采纳、包容，继承与创新交织的精彩学术氛围孕育着燕京医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在学术水平上居于全国的前列。

中医教育（第十三章）：建国初期（1949~1965年），仅有陈慎吾创办的私立北平中医研究所（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师承教育均为民间自发的组合，比较分散。1950~1951年，北京先后创办了2所中医进修学校开始中医进修教育，其中北京市属的中医进修学校可谓是北京中医人才培养的摇篮。

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次举办了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带动了北京及全国的西医学习中医教育。1956年及1968年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北京认真贯彻和落实了这两项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曾在全国中医工作会议上介绍过这方面的经验。此后还开办了中医中专学校及中医护士学校。

1966~1976年，中医教育同样经历了缓慢发展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1977~2000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北京中医学院（后改名北京中医药大学）恢复正常运转，北京第二医学院和北京市中医学校联合举办了一届中医本科班，1978年11月北京中医学院分院成立，曾更名为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2001年并入首都医科大学），均为北京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中医药人才。1977年中医研究院首次举办了中医研究生班，招收硕士生。1983年和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随后又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两项举措的实施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中医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中医药人才。教育形式也从建国前的以民办教育、师承家传教育为主，发展为以国家举办学院式教育为主，以民办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为辅。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等多层次办学，以及学历教育与岗位教育、留学生教育等类型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多次调整，在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方面更为合理。总之，北京中医教育的迅速发展，主要取决于党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首都的区位优势，并得益于北京中医药丰富的医药卫生资源。

中医科研工作（第十四章）：北京的中医药科研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突出的有协和医学院药理室、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的陈克恢、赵承嘏、赵燏黄等一批当时的科学精英，他们的研究作为后来的中医药科研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医药科研的先驱。

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1955年卫生部直属中医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医科研地位的确立。1959年中医药科技工作列入我国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均为中医药科研队伍建设和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59年10月，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成立，也成为卫生部在全国设立的科研基地之一。

1977~1985年，中医科研工作在发展方向、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医药科研工作范围也从中医临床、中药研究扩大到中医诊断、针灸仪器等方面的开发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部分企业创办和民办的中医科研机构。各级政府坚持“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的方针，加强了对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宏观管理，改变了以往重临床轻基础的研究状况。北京在心脑血管病、脾胃病、肝病、多脏器功能衰竭、肿瘤、皮科、针麻以及青蒿素、人工麝香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北京已基本形成了中医药科研机构密集、设备齐全、科研队伍完备、人才济济的城市，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及部属科研机构、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大专院校，也承担了许多科研任务，形成了多个中医药科研的“国家队”。

中西医结合事业（第十五章）：自16世纪中叶西医开始传入中国，在相互的影响下，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应运而生。至19世纪中叶，西医学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国医学史上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潮。早在1928年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于伤病员要用中西两法治疗。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边区政府也曾组建了“国医研究会”、“中西医研究会”等学术团

体。在 1955 年北京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报告中，毛泽东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强调“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从而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简称“西学中”），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使我国中医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道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了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与方法，而且在科研队伍上，以高级“西学中”人员为骨干，在诸多著名老中医亲自参与与指导下，组成了精干的研究班子，先后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由于首都区位优势，中外学术交流的活动频繁，北京中医不仅在国内学术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与国际学术界合作交流上也是主要的窗口。1981 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形成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的网络系统，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 展。另外还创办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骨伤》、《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杂志》等，举办了多次大型中西医结合国际学术会议，在海内外影响至为深远。

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人员的培养与实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又培养了中西医结合硕士、博士，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新生力量，同时也造就了一批“高明的理论家”和国内外知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如陈可冀院士、韩济生院士、陈竺院士、肖培根院士等。

总之，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首创的一种新医学，北京从首次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开始，培养了大量的“西学中”医师，中西医结合硕士生、博士生，并在临床研究、实验研究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医药学术团体（第十六章）：中医药学术团体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中医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西学东渐”影响下产生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隆庆二年（1568 年），由在京的徐春甫等人发起创办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1568 年），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医学学术团体，比英国皇家医学会（1660 年）还要早近百年。清末维新派康有为等曾提出“仿西学、建学会、广人才、振中国”的主张。当时由太医院组成的“北京中医学会”即为其一。中华民国时期，中医学会和学术团体日渐增多，如神州医药总会、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中西医学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国科学研究社等。1947 年施今墨等发起的“中国医药学会”（最后靠挂在“世界科学社”下）等，对中医药学术的研究与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药学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50 年创办了北京中医学会。1979 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相继成立的有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针灸学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北京针灸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2000 年北京中医学会建会 50 周年，连同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和北京针灸学会共拥有会员 10 243 人。4 个国家级的学会联系着全国 19 万名会员。总之，学会汇集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广大精英，在学术上互相交流，为中医药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北京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团体的中心并且辐射到全国。

中医药出版事业（第十七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医药相关的出版社只有上海的千顷堂、锦章书局、广益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书的种类和发行数量都很有限。1953 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开始选择了一批经典名著如《黄帝内经·素问》、《黄帝

内经·灵枢》影印出版，也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解释》等白话文语译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对一些重要巨著如《本草纲目》重新标点排印出版。为了适应高等中医教育，高等教育委员会也组织编写出版《中医内科学概要》等系列高等教材。其次是中医药期刊，1954年在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的决议。期间有10余种相关期刊出版。随后有《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杂志》、《北京中医》等。《中医杂志》1981年之后创办了6种外文版式，其影响扩展到国外。其他尚有《中药通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国医学文摘·中医》等，有几十种之多。相关的报纸如《健康报》，1983年3月8日开办了“传统医药”版。1989年1月2日，中国中医药行业唯一的国家级报纸《中国中医药报》在京创刊。另外，《中国医药报》也开辟了传统医学版。有些非中医专业报纸如《北京卫生报》、《健康咨询报》、《保健养生报》等也刊登了中医中药的文章，丰富了中医药出版物。北京中医药出版事业的长足发展，主要取决于人们对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和中医政策的推动，以及首都特殊地位的优势，北京已逐渐成为全国中医药出版事业的中心。

对外交流与合作（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对外主要表现为专家的互访与交流、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医疗队以及名中医援外或出国会诊。1956年7月，苏联曾派遣由3名专家组成的针灸考察小组来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学习针灸理论和临床3个月。195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科阎润茗大夫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治疗坐骨神经痛，针刺4次即痊愈。同时，该院还为中蒙友谊医院培养了数十名针灸师。1962年，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患尿路结石合并左肾功能衰竭。岳美中大夫受命参加中国医疗组，承担了中医药治疗苏加诺疾病的任务。治疗91天后复查结果令人满意，左肾结石影消失，肾功能基本恢复。1963年4月6日，由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湖南、江苏、辽宁、长春等地的24名优秀医务人员组成了我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派往阿尔利亚，开始了履行国际人道主义的行程。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后的第一年（1957年）就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成为全国40所大学中最早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之一。

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我国相继与世界各国的卫生组织重新合作，随着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北京与其交流合作机会日益增加。1975年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创办“外国医生培训班”（后更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专门从事外国人员针灸培训工作。1980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中医医院也成立了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北京地区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援外医疗、召开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外，还有联合办学、合办中医院和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MIDDLESEX大学合作，开办了五年制中医高等学历教育。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与德国合办了魁茨汀中医院，是我国成功地在境外创办中医医院的典型范例。中国中医研究院与坦桑尼亚政府合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向世界展示了中医中药在防治危重疾病中的优势。北京以其特有的政治、人文、地理区位优势，已经成为对外交流合作的基地和展示北京新发展、新面貌的窗口。

通过3年的课题研究和两年多的反复修改，本书初步揭示了北京近百年来中医发展的脉络与规律，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北京的历史文化特点具有全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多元性、较大应变升华的包容性和高雅厚重等特点，北京中医学的特点与其是一脉相通的。概括

起来，北京占有中国历史文化与地理区位的明显优势，在学术上独具太医院宫廷医学学派的传承，汇聚与培养了多学派的名医群体和多学科的精英，人才济济；具有从御药房到同仁堂丰厚的中药文化底蕴；对于人才的培养，在师承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孕育并创立了高等学历教育的新模式；在“西学东进”的浪尖上，从中西医汇通涌向中西医整合的激流，创立与发展了中西医结合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地处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势必成为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的前沿，并力争成为落实政策的示范园区。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方针政策中，北京在医政、医疗、科研、教育等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成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地与窗口。

本书的出版，不但填补了北京近代中医发展历史的空白和文化史略，与时俱进，必将对北京中医药事业今后的继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且对于全国中医药也将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高中文化以上的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中西医药界工作者、管理人员、中西医药院校师生、医史研究者，以及广大中医药爱好者或历史文化爱好者，也可作为各类大学图书馆、医史文献馆馆藏之用。

本书是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课题成果撰写的。该课题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主持，在北京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等单位共同努力和有关领导、专家的全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完成。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由于中医百年来的资料庞杂而且分散，所以资料搜集工作十分艰辛，工作量巨大，参与写作的同仁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向人民交上了这份答卷。尽管如此，由于时间和我们水平的限制，本书无疑仍存在不少的缺憾甚至错误，如蒙读者不吝指正，我们将十分感谢。

编著

2006年12月